

[DOI] 10.19653/j.cnki.dbcjdxsb.2026.01.006

[引用格式] 杨沫,陈雨,王晓.收入不平等何以影响社会信任——基于多维公平感的机制分析[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6(1):69-83.

收入不平等何以影响社会信任

——基于多维公平感的机制分析

杨沫¹, 陈雨², 王晓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 从多维公平感的视角, 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具有负向影响。机制检验发现, 提高居民在收入与财富分配、工作与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平感, 均可有效缓解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 其中社会保障公平感的作用最突出。值得注意的是, 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在高学历或家庭收入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的群体中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收入不平等如何通过多维公平感影响社会信任提供了理论阐释和经验证据, 对厚植社会信任根基、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关键词: 社会信任; 收入不平等; 多维公平感; 共同富裕; 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96(2026)01-0069-15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4年,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575万元,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344万美元, 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标志着中国在完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之后, 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 以基尼系数等指标衡量, 中国的收入分配在城乡、区域和行业间存在结构性差距, 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构成制约, 需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予以系统性应对。当前, 社会资本在社会治理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易被忽视^[1-2]。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奠基者, Coleman^[3]从功能主义视角指出, 社会资本是行动者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开展社会互动过程中所形成并维系的社会

收稿日期: 2025-09-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扩张政策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72203231)

作者简介: 杨沫(1989-), 女, 湖南益阳人, 副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收入分配、城镇化和市民化研究。E-mail: yangmo@cass.org.cn

陈雨(2001-), 女, 山东菏泽人, 硕士, 主要从事收入分配研究。E-mail: cy_banchen@163.com

王晓(1983-), 女, 山东淄博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收入分配、代际流动研究。E-mail: 20108594@sdufe.edu.cn

关系网络。其中,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不仅反映社会关系的质量和社会情绪的积极或消极倾向,也是促进社会团结的关键因素。社会信任通过影响个体对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的配置决策,塑造个体的经济行为。因此,在当前推进社会转型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信任这一非制度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收入不平等是否对社会信任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地,能否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机制有效缓解乃至抑制这一负向影响,从而为厚植社会信任根基提供制度支撑?现有国外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社会信任具有负向影响^[4-5]。此外,这种影响因个体所处的收入阶层、种族、语言和性别等社会身份特征呈现明显的异质性^[6]。

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内在机理,现有研究提出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基于同质性偏好原理,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会导致社会分化,增加不同群体间交流的社会障碍,因而在相同的信任半径内,人们与“非同类”个体互动的频率和效率都会降低^[4];第二种观点基于资源冲突假设,认为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地区,资源分配上的分歧容易引发矛盾,破坏社会联系,削弱社会信任^[7];第三种观点强调个体感知的作用,认为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个体会更加敏感,不公平感会对个体情绪产生负向影响,导致对社会和其他人的猜疑与不信任^[8]。个体不公平感的产生源于将自己与周围其他人进行比较。在收入不平等较为严重的地区,普通个体更容易意识到自身的劣势地位,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并可能引发愤怒、悲伤、消极或不满等情绪^[9]。

依据收入来源的性质,可将个体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等。不同来源收入的不平等对个体主观感知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收入与财富分配公平感、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感和社会保障公平感。尽管现有国外研究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但鲜有研究将关注点聚焦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更少有研究深入分析多维公平感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在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后,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等主观福祉水平已成为中国改革的核心目标。基于此,本文利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数据,以各省份个体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基于居民主观评价的社会信任指标,从多维公平感的视角深入探究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本文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收入不平等的工具变量,在满足相关性和排他性约束的假设下,有助于缓解由遗漏变量、反向因果和测量误差所引致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为识别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因果效应提供更为可靠的估计依据;其二,现有研究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机制分析多停留于理论层面,本文则以多维公平感为切入点,实证检验收入与财富分配、工作与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维度的公平感在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其三,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多维公平感中,社会保障公平感的作用最为显著。这一发现表明,相较于其他维度,居民更重视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底线公平感”。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社会信任是社会主体在交往过程中互相认同、相互信赖的一种心理状态,存在于信任双方“托付—回报”动态反馈形成的“信任链”之中^[10]。社会信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时,对他人是否值得依赖的一种心理特征^[11]。社会信任通过影响个体对社会环境

的感知和预期, 引导其行为决策。因此, 社会信任有助于提高现代社会的运转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12]。同时, 在高信任度的环境中, 自发性的社会交往更为活跃, 中间层社团组织更为健全, 从而有助于形成强大的社会向心力^[13]。此外, 社会信任不仅有助于促进风险分担和非正式信贷交易, 为相对贫困群体拓展发展机会^[4], 还通过提升个体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意愿 (如更倾向于使用股票等金融工具), 推动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14]。在此基础上, 社会信任亦能增强公众对合作项目的信心, 从而吸引更多潜在捐赠者, 并提高资金募集效率^[15]。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务工, 原有的社会网络逐渐失去作用, 中国正逐步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传统基于熟人关系的信任模式与体系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减弱^[16]。同时, 随着与陌生人互动机会的增加, 信任半径扩大, 社会交往中的风险也随之上升, 这对社会信任的培育构成新的挑战。因此, 厚植社会信任根基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明确社会信任的形成机制及其主要不利影响因素, 对于增强社会信任至关重要。

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家庭与社区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三类。作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 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长期受到学术界关注。大量国外研究证实, 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具有负向影响^[4-5]。李骏和吴晓刚^[17]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收入不平等会提高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 强化社会等级观念, 激化阶层间冲突并提高相对剥夺感, 从而削弱人际信任、社会凝聚力, 降低协作水平。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 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具有负向影响。

公平感是指公众以心中对社会应有公平状态的认知为基准, 对社会实际公平状况所作出的主观判断。根据相对剥夺理论, 当个体在与他人比较的过程中感知自身利益受损时, 可能产生不公平感^[18]。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 个体的相对剥夺感提高, 主观不公平感随之提高, 进而引发负面情绪, 并导致其对社会及他人产生不信任心理^[5]。因此, 公平感对社会信任具有重要影响, 收入不平等可能通过作用于居民的主观感知, 间接影响社会信任。在现实中, 个体可从多个维度感知与收入相关的公平感: 收入公平感是客观收入不平等在心理层面的直接反映; 财富分配公平感则与财产性收入的公平性相关; 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感主要关联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公平性; 社会保障公平感则源于对转移支付 (如养老金、社会救助等) 公平性的感知。因此, 收入不平等对个体主观感知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上述多维公平感之中。

现有研究虽将公平感作为探讨收入不平等影响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等主观心理状态的机制变量, 但尚未从多维公平感的视角开展系统深入的分析, 亦未对不同维度作用机制的相对强弱进行比较。例如, 赵昕东和赵德金^[19]发现, 在机会不平等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路径中, 不平等的就业与工作机会降低了居民的工作满意度, 并引发主观不公平感, 进而削弱社会信任。李实和张尉^[20]的研究表明, 个体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显著降低了其生活满意度。

此外, 居民对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观评价是公平感的重要维度, 其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不容忽视。低收入群体普遍期望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强化收入再分配来提升其收入, 这种高期望反而可能导致其对现行社会保障水平的评价偏低。然而,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安全网, 能够满足居民对身心安全的基本需求, 缓解其生存焦虑, 从而为厚植社会信任根基提供基础性支撑^[21]。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 居民对收入与财富分配、工作与就业、社会保障的公平感知在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尽管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可能受益于现有分配格局, 但由于其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信息获取能力, 他们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后果更为敏感^[22]。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

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经济地位通常也越高。Robinson和Bell^[23]提出的启蒙主义理论认为,教育传递了同情弱势群体的价值观,使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的平等偏好呈正相关关系,即收入不平等对高学历群体的社会信任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根据本体性安全理论,个体信任源于其对自身存在状态的安全感。高学历群体更关注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发展机会越公平,其本体安全感越强,从而更倾向于信任他人。因此,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在不同学历群体中可能存在差异。

林聚任等^[24]研究发现,在主观认为收入分配“很不公平”或“较不公平”的样本中,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占比较高。高收入群体通常承担更高的税负,若其认为税负分配不公,剥夺感也可能更强。同时,由于高收入群体信息获取能力更强,对社会公平问题更为关注,因而更容易产生不公平感知^[19]。此外,中等收入群体对收入平等的主观感知也较强。杨灿^[25]研究表明,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其主观社会认同感越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间存在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一)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社会信任(*Trust*),采用CSS问卷中针对主观问题“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回答来衡量,其测量采用10分制量表。其中,1表示非常不信任,10表示非常信任。取值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收入不平等(*Gini*),采用各省份个体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作为代理变量,具体计算方法为 $Gini = \left(\sum_{j=1}^N \sum_{k=1}^N |X_j - X_k| \right) / 2\mu N^2$ 。其中, X_j 和 X_k 分别为样本 j 和样本 k 的收入, μ 代表全部样本的收入均值, N 代表样本量。

3. 机制变量

总体社会公平感(*Overall Fair*)。本文采用CSS问卷中的“总体社会公平感”来衡量居民的总体社会公平感。总体社会公平感的测量采用10分制量表。其中,1表示非常不公平,10表示非常公平。

综合公平感(*CompFair*)。本文采用综合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对多个维度的公平感采用熵权法赋权计算得到综合公平感指标,该方法依据数据本身的离散程度自动确定权重,避免了主观赋权带来的偏差,提升了指标的科学性和稳健性。综合公平感包括三个细分维度:收入与财富分配公平感(*WealthFair*)、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感(*WorkFair*)、社会保障公平感(*InsFair*)。上述三个指标采用4分制量表测度。其中,1表示非常不公平,4表示非常公平。在综合公平感的计算过程中,本文对三个细分维度的指标进行了0—1之间的标准化处理,得到的综合公平感取值范围为[0, 1]。

本文将社会保障公平感进一步细化为养老保障公平感(*EldEval*)、医疗保障公平感(*MedEval*)、就业保障公平感(*EmpEval*)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公平感(*PovEval*)四个子维度,以深入探究不同社会保障领域的公平感在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这四个指标均采用10分制量表测度。其中,1表示非常不公平,10表示非常公平。

4.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层面和省级层面的一系列变量。个体层面包括：户籍状况 (*Hukou*)，农业户口=1，非农业户口=0；年龄 (*Age*)，采用统计时点的实际年龄衡量；性别 (*Gender*)，男性=1，女性=0；就业状况 (*Job*)，有工作=1，其他=0；婚姻状况 (*Unmarried*)，未婚=1，其他=0；已婚或同居状况 (*Married*)，已婚/同居=1，其他=0；离异或丧偶状况 (*Wid*)，离异/丧偶=1，其他=0；政治面貌 (*PCP*)，中国共产党党员=1，其他=0；民族 (*Ethnical*)，汉族=1，其他=0；受教育年限 (*Edu_year*)，未上过学=0，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学=16，研究生及以上=19；个体收入状况 (*Income*)，采用个体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家庭总收入状况 (*Fincome*)，采用家庭总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城乡划分 (*Rural*)，农村=1，城市=0。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还包括个体的职业、行业和工作单位性质。^①

省级层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Pgdp*)，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衡量；高等教育状况 (*CollStu*)，采用每十万人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城镇化率 (*Urban_ratio*)，采用城镇常住人口与总常住人口之比衡量；经济开放度 (*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地方政府治理状况 (*Finance*)，采用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第一产业占比 (*Industry*)，采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第三产业占比 (*Service*)，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城镇居民生活水平 (*Urban_per*)，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

(二) 模型构建

在本文的研究中，社会信任变量的取值为被访者的主观评分，属于有序分类变量。为有效检验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有序 Probit 模型：

$$Trust_{idt} = \beta_0 + \beta_1 Gini_{dt} + \beta_2 X_{idt} + \beta_3 W_{dt} + \pi_d + year_t + \varepsilon_{idt} \quad (1)$$

其中， $Trust_{idt}$ 表示第 d 个省份中第 i 位受访者在第 t 年的社会信任水平。 $Gini_{dt}$ 表示第 d 个省份在第 t 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为提高基准回归估计的准确性，式 (1) 还控制了可能影响社会信任的个体层面和省级层面控制变量。 X_{idt} 表示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等； W_{dt} 表示省级特征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状况等； π_d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year_t$ 表示年份控制变量； ε_{idt} 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覆盖全国31个省份，共包含151个县（市、区）和604个村（居）委会。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分别回收有效问卷10 243份、10 143份和10 283份。

根据研究设计，本文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剔除社会信任问题缺失的观测值；剔除个体及家庭收入等关键变量回答缺失或选择“不确定”的观测值；剔除年龄小于18周岁或大于69周岁的个体；在剔除在校学生及丧失劳动能力人群的基础上，计算各省份个体收入的基尼系数；将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各省级层面的宏观数据匹配至对应的微观个体样本。经过上述处理，本文最终获得22 750个有效观测值。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社会信任的均值为6.000（满分为10分），标准差为1.939，中位数为6，表明样本整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处于中等偏上区间，分布呈“橄榄形”特征，约80%的受访者信任得分集中在5—8之间，反映出社会信任存在一定的分化，但未出现极端低信任或高信任的集中趋势。在公平感方面，总体社会公平感的均值为6.800，综合公平感的均值为

① 职业、行业和工作单位性质的分类参见历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0.610，表明居民对社会公平的整体感知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然而，具体细分领域的公平感存在显著差异。收入与财富分配公平感、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感的均值分别为2.629、2.474，低于中位数，表明居民对收入分配机制和就业机会平等性的满意度较低；社会保障领域中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公平感的均值分别仅为6.331、6.290、5.330和5.529，表明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在基本民生保障和弱势群体支持方面的公平性与居民期望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社会信任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居民对收入与财富分配、工作与就业机会的公平感不高，在医疗保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关键民生领域亦表现出较高的公平性关切，反映出制度公平性与中国社会信任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社会信任	<i>Trust</i>	22 750	6.000	1.939	1	6	10
收入不平等	<i>Gini</i>	22 750	0.542	0.058	0.357	0.543	0.742
总体社会公平感	<i>OVFair</i>	22 750	6.800	1.700	1	7	10
综合公平感	<i>CompFair</i>	22 750	0.610	0.177	0	0.628	1
收入与财富分配公平感	<i>WealthFair</i>	22 750	2.629	0.735	1	3	4
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感	<i>WorkFair</i>	22 750	2.474	0.801	1	3	4
社会保障公平感	<i>InsFair</i>	22 750	2.715	0.776	1	3	4
养老保障公平感	<i>EldEval</i>	21 581	6.331	2.624	1	6	10
医疗保障公平感	<i>MedEval</i>	22 233	6.290	2.537	1	6	10
就业保障公平感	<i>EmpEval</i>	18 333	5.330	2.576	1	5	10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公平感	<i>PovEval</i>	18 382	5.529	2.756	1	5	10
户籍状况	<i>Hukou</i>	22 750	0.669	0.471	0	1	1
年龄	<i>Age</i>	22 750	47.040	12.954	18	48	69
性别	<i>Gender</i>	22 750	0.455	0.498	0	0	1
就业状况	<i>Job</i>	22 750	0.718	0.450	0	1	1
婚姻状况	<i>Unmarried</i>	22 750	0.071	0.257	0	0	1
已婚或同居状况	<i>Married</i>	22 750	0.867	0.340	0	1	1
离异或丧偶状况	<i>Wid</i>	22 750	0.062	0.241	0	0	1
政治面貌	<i>PCP</i>	22 750	0.109	0.312	0	0	1
民族	<i>Ethnical</i>	22 750	0.949	0.219	0	1	1
受教育年限	<i>Edu_year</i>	22 750	8.986	4.217	0	9	19
个体收入状况	<i>Income</i>	22 750	8.569	3.341	0.000	9.855	15.895
家庭总收入状况	<i>Fincome</i>	22 750	10.567	1.485	0.000	10.820	15.895
城乡划分	<i>Rural</i>	22 750	0.441	0.497	0	0	1
经济发展水平	<i>Pgdp</i>	22 750	4.740	0.156	4.414	4.720	5.209
高等教育状况	<i>CollStu</i>	22 750	4.859	2.128	3.106	3.424	8.579
城镇化率	<i>Urban_ratio</i>	22 750	58.753	9.185	42.013	57.220	88.301
经济开放度	<i>Open</i>	22 750	0.038	0.034	0.002	0.020	0.167
地方政府治理状况	<i>Finance</i>	22 750	0.226	0.081	0.120	0.209	0.753
第一产业占比	<i>Industry</i>	22 750	0.090	0.043	0.003	0.089	0.241
第三产业占比	<i>Service</i>	22 750	0.498	0.058	0.399	0.496	0.837
城镇居民生活水平	<i>Urban_per</i>	22 750	10.441	0.218	10.076	10.433	11.21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根据基准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混合估计,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系数为负, 且在 5% 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低。该结果支持假说 1, 表明收入不平等是削弱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

表 2 基准模型有序估计结果

变量	<i>Turst</i>	变量	<i>Turst</i>	变量	<i>Turst</i>	变量	<i>Turst</i>
<i>Gini</i>	-0.330** (0.148)	<i>PCP</i>	0.132*** (0.023)	<i>CollStu</i>	-0.212** (0.102)	职业	控制
<i>Hukou</i>	0.032** (0.019)	<i>Ethnical</i>	-0.031 (0.033)	<i>Urban_ratio</i>	-0.009** (0.004)	行业	控制
<i>Age</i>	0.006*** (0.001)	<i>Edu_year</i>	-0.009*** (0.012)	<i>Open</i>	-1.283* (0.699)	工作单位性质	控制
<i>Gender</i>	-0.020 (0.015)	<i>Income</i>	0.004* (0.003)	<i>Finance</i>	-0.127 (0.209)	省份/年份 FE	控制
<i>Job</i>	0.099*** (0.024)	<i>Fincome</i>	0.019*** (0.006)	<i>Industry</i>	-0.334 (0.387)	样本量	22 750
<i>Married</i>	-0.085** (0.029)	<i>Rural</i>	0.117*** (0.017)	<i>Service</i>	0.496 (0.294)	Pseudo R ²	0.015
<i>Wid</i>	-0.165*** (0.042)	<i>Pgdp</i>	0.410* (0.227)	<i>Urban_per</i>	-0.199 (0.142)	LRχ ²	1 434. 213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下同。

个体层面, 农业户口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高于非农业户口居民, 反映出城乡社会结构差异, 以及传统乡土社会中基于熟人关系的信任机制仍具有较强韧性。年龄对社会信任具有正向影响, 表明随着个体社会经验的积累, 其对社会整体的信任程度趋于提升。就业状况为“有工作”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更高, 表明稳定的经济地位有助于增强社会融入感和信任意愿。婚姻状况方面, 已婚或同居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未婚者, 可能反映了家庭责任加重带来的心理压力, 或婚姻关系中的冲突削弱了对外部社会的信任。而离异或丧偶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低, 反映了家庭关系变动对个体心理安全感的负向影响。政治面貌方面,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社会信任水平更高, 体现了制度认同、组织归属感和政治参与度对社会信任的促进作用。

受教育年限对社会信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这一结果可能源于高学历个体具备更强的认知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因而对他人行为更具审慎态度, 表现出更高的风险意识和较低的默认信任倾向。家庭总收入状况正向影响社会信任, 而个体收入状况的系数为正, 但仅在 10% 水平上显著, 表明家庭层面的经济保障比个体收入更能有效支撑社会信任形成, 反映出中国社会“以家为本”的文化传统和家庭支持网络在社会信任建构中的核心作用。与城镇地区相比, 农村地区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更高, 这可能是因为农村社会基于熟人关系的网络结构增强了社会信任。

省级层面, 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信任具有正向影响, 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改善公共服务、降低不确定性, 从而增强社会整体信任。高等教育状况对社会信任具有负向影响, 表明高学历群体因认知理性化而对社会交往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城镇化率对社会信任具有负向影响, 表明城市化进程中的陌生人社会特征加剧了人际疏离, 并提高了信任成本^[26]。经济开放度对社会信任具有负向影响, 表明较高的外部经济依赖可能带来文化冲突、社会流动加速和社会整合压力, 进而削弱本地社会信任。

此外,地方政府治理状况、第一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等控制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当前模型设定下,这些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总体而言,本文所纳入的控制变量中,除少数变量外,多数均在统计上显著,且经济含义清晰,能够较好地捕捉个体和省级层面影响社会信任的关键因素。本文进一步计算收入不平等对不同社会信任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如图1所示。纵轴表示基尼系数每上升0.1个单位时,对应社会信任水平的概率变化。实心点为边际效应值,虚线区间为95%置信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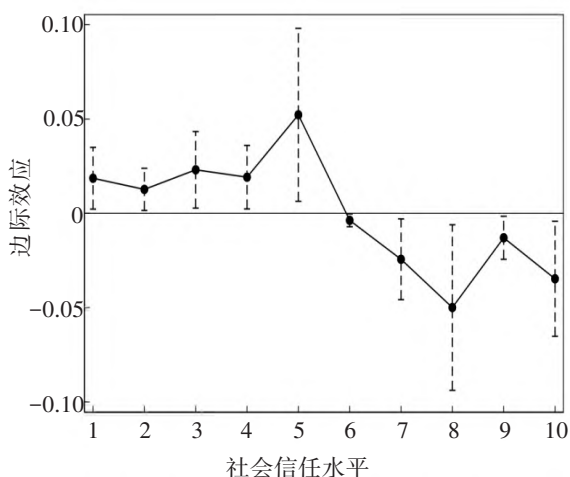


图1 收入不平等对不同社会信任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

本文基于式(1)计算收入不平等在各社会信任水平上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水平为5和8的群体影响最为显著:当收入不平等每上升0.1个单位时,社会信任水平为5(低于均值6)的概率增加约5个百分点,而社会信任水平为8(高于均值6)的概率下降约5个百分点;在社会信任水平的均值6附近,边际效应接近于零,表明收入不平等对该群体的影响较弱,呈现“中间群体免疫”特征。由此可见,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不仅加剧低信任群体的信任缺失,还抑制高信任群体的信任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的均值6成为明显的分界点。该结果支持假说1。

(二) 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可能面临三类问题。一是遗漏变量偏误。个体能力、家庭氛围等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同时影响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信任。例如,在良好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个体可能心理更健康、收入更高,且对社会更具信任感,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系数存在估计偏误。二是反向因果关系。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地区,社会资本更丰富,人际交往障碍较少,可能促进经济合作与分配公平,进而降低收入不平等,形成双向因果。三是测量误差。本文采用基于CSS数据的各省份个体收入的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平等的代理变量。然而,该指标可能存在两方面偏差:高收入群体在调查中易被遗漏,导致收入分布低估;以各省份个体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难以反映个体实际感知的局部不平等程度,从而引起测量误差。为应对上述问题,本文采取双重策略。一是针对前两类内生性问题(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因果识别。二是针对第三类测量误差问题,通过替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回归^①

本文选取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底各省份第一档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基尼系数的工具变量。选择依据是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存在潜在调节作用。Freeman^[27]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影响。最低工资改善收入差距存在临界值,若低于临界值,提高最低工资可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若高于临界值,则可能导致部分人失业,反而扩大差距。叶林祥等^[28]指出,尽管中国最低工资标准逐年提高,但其增幅仍低于平均工资增速,整体处于偏低水平。因此,本文认为当前阶段各省份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有效缓解居民收入不平等,且其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主要通过收入不平等实现。

参考Roodman^[29]的方法,本文采用条件混合过程(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 CMP)估计法

①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进行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远大于 10 的经验阈值, 有效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最低工资标准与基尼系数显著负相关: 最低工资每提高 1%, 基尼系数下降 0.003。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基尼系数的系数为 -1.150, 且在 5% 水平上显著, 其绝对值 (1.150) 大于基准有序 Probit 模型中基尼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 (0.330), 表明基准模型因内生性问题低估了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若最低工资标准通过制度信任或劳动力市场稳定性等渠道直接影响社会信任, 则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可能不成立, 从而影响本文的因果识别。

2. 替换解释变量

为检验测量误差对结果的潜在影响, 本文在工具变量框架下替换收入不平等指标。具体包括: 省级层面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区县层面个体收入基尼系数、区县层面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区县层面个体收入城乡泰尔指数、区县层面家庭收入城乡泰尔指数。估计结果^①表明, 无论采用何种替代指标, 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均具有负向影响, 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进一步比较发现: 在省级层面, 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的负向影响强于个体收入基尼系数; 在区县层面, 个体收入基尼系数的负向影响强于家庭收入基尼系数。这一差异可能源于比较参照系的不同: 在较小地理范围 (如区县) 内, 个体更倾向于直接与邻里比较个体收入; 而在较大范围 (如全省) 内, 居民更可能以家庭为单位比较整体经济地位。该发现为理解信任半径与不平等感的互动机制提供了新证据。

五、机制检验

前文研究表明, 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具有负向影响。那么, 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具体机制是什么?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 在现实情境中, 个体对公平性的感知主要源于与他人的比较。当个体主观认为自身遭受不平等对待, 或感知到社会整体存在系统性不公平时, 便可能产生负面情绪, 进而削弱其对他人、政府或社会机构的信任。随着客观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更易察觉与他人的差距, 从而增强不公平感。在此背景下,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 当前中国客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是否通过影响居民的公平感, 进而影响社会信任? 依据假说 2, 个体可从多个维度感知与收入相关的公平性。为检验公平感在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本文构建如下两阶段回归模型:

$$Fairness_{idt} = \rho_0 + \rho_1 Gini_{dt} + \rho_2 X_{idt} + \rho_3 W_{dt} + \pi_d + year_t + s_{idt} \quad (2)$$

$$Trust_{idt} = \mu_0 + \mu_1 Gini_{dt} + \lambda Fairness_{idt} + \mu_2 X_{idt} + \mu_3 W_{dt} + \pi_d + year_t + \xi_{idt} \quad (3)$$

其中, $Fairness_{idt}$ 表示第 d 个省份、第 i 位受访者在第 t 年的总体社会公平感或某一维度的公平感, 其取值越高, 表示个体的公平感越强。 ρ_1 表示收入不平等对公平感的影响: 若 $\rho_1 < 0$, 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公平感越弱; 反之则越强。 λ 表示公平感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若 $\lambda > 0$, 表示公平感越高, 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反之则越低。进一步地, 对比式 (1) 中收入不平等的系数 β_1 与模型 (3) 中的 μ_1 , 若 $\mu_1 < \beta_1$, 且 λ 显著为正, 则可认为在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中涉及公平感的变化。

(一) 总体公平感的影响

基于式 (2) 和式 (3), 本文分别以总体社会公平感和综合公平感作为机制变量进行机制检验, 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列 (1) 和列 (2) 显示, 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系数为负, 且在 5% 水

① 估计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 留存备案。

平上显著,这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居民的总体社会公平感越低。在引入总体社会公平感作为机制变量后,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5%水平上显著,但其系数绝对值较基准回归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有所下降(0.891<1.150)^①,这表明在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中涉及总体社会公平感的变化。表3列(3)和列(4)进一步将机制变量替换为综合公平感,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0%水平上显著。在控制综合公平感后,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5%水平上显著,其系数绝对值较基准回归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有所下降(0.981<1.150)。这表明,即使采用基于多个维度构建的综合公平感指标,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仍被削弱,表明该机制具有稳健性。

表3 总体公平感的机制检验

变 量	(1)	(2)	(3)	(4)	变 量	(1)	(2)	(3)	(4)
	<i>OvFair</i>	<i>Trust</i>	<i>CompFair</i>	<i>Trust</i>		<i>OvFair</i>	<i>Trust</i>	<i>CompFair</i>	<i>Trust</i>
<i>Gini</i>	-0.197** (0.095)	-0.891** (0.421)	-0.208* (0.100)	-0.981** (0.420)	年份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OvFair</i>		1.671*** (0.033)			常数项	1.844*** (0.449)	4.087*** (1.332)	1.255*** (0.060)	0.033* (0.019)
<i>CompFair</i>				0.862*** (0.037)	样本量	22 750	22 750	22 750	22 7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值	4.200		3.192	
省份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R χ^2		17 949.320		1 918.490

注:表中数据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下同。

(二) 不同维度公平感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剖析并对比不同维度公平感在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前文实证结果表明,通过多维度加权构建的综合公平感在该机制中发挥显著作用。然而,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哪一个维度的公平感具有最突出的影响?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对机制本质的理解,更关乎如何有效提升社会整体信任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议题。为此,本文分别将收入与财富分配公平感、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感、社会保障公平感作为式(2)和式(3)中的机制变量,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分析。为便于比较不同维度公平感的作用大小,本文对上述机制变量都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取值范围均为[0,1]。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列(1)、列(3)和列(5)的结果显示,当收入不平等水平提高时,在三个维度的公平感中,收入与财富分配公平感的降幅最大,表明当收入不平等加剧时,个体首先关注自身收入与他人之间的差距以及家庭财产地位的相对落差,其次关注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对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性的感知则不显著。表4列(2)、列(4)和列(6)结果显示,在控制各维度公平感后,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其系数绝对值较基准回归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均有所下降(1.040<1.150, 1.116<1.150, 0.735<1.150),表明这三个维度均为重要作用机制,假说2成立。

进一步比较三个维度的公平感的影响强度可知,社会保障公平感在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机制中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越小,意味着该维度公平感在传导机制中所起的作用越强。在控制社会保障公平感后,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减弱了约36.1%^②,这反映出社会保障公平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平感知,而是一种“底线公平感”或“安

① 由于本文后续所有估计均基于工具变量法,故需将其结果与工具变量回归进行对照。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中,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系数为-1.150,且在5%水平上显著。

② 计算方法为(0.735-1.150)/1.150≈-0.361。

全网信任”，直接关联个体的生存安全感和对国家基本保障能力的信心。因此，提高社会保障公平感不仅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更能显著削弱收入不平等带来的负向影响。政策上应优先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以增强社会信任。

表4 不同维度公平感的机制检验

变 量	(1)	(2)	(3)	(4)	(5)	(6)
	<i>WealthFair</i>	<i>Trust</i>	<i>WorkFair</i>	<i>Trust</i>	<i>InsFair</i>	<i>Trust</i>
<i>Gini</i>	-0.099*** (0.038)	-1.040*** (0.420)	-0.045 (0.040)	-1.116*** (0.420)	-0.064** (0.030)	-0.735* (0.421)
<i>WealthFair</i>		1.176*** (0.073)				
<i>WorkFair</i>				1.015*** (0.063)		
<i>InsFair</i>						6.897*** (0.2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523*** (0.151)	0.036* (0.019)	-0.135 (0.156)	0.039 (0.019)	0.178** (0.073)	0.020 (0.019)
样本量	22 738	22 750	22 750	22 750	22 750	22 750
F值	3.100		6.750		1.431	
LR χ^2		15 687.201		15 683.170		16 613.230

(三) 不同维度社会保障公平感的影响

本文将养老、医疗、就业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四个子维度的公平感作为解释变量，对社会保障公平感进行回归分析。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本文剔除了“不确定”“拒绝回答”的样本，各维度社会保障公平感取值范围为 [1, 10]。表5列(1)结果显示，上述四个子维度的公平感均对社会保障公平感具有正向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个体对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其整体公平感知越强。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四个子维度的公平感是否均对社会信任产生独立影响？多维公平感是否构成了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其中，哪一个维度公平感的影响最为显著？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分别将养老保障公平感、医疗保障公平感、就业保障公平感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公平感作为式(2)和式(3)中的机制变量，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列(2)至列(9)所示。表5列(2)、列(4)、列(6)和列(8)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公众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保障及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公平感知越低，且各项回归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削弱不同群体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感。其中，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公平感受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强（系数绝对值最大），反映出底层群体在社会公平感知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进一步考察各类社会保障公平感在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发现在控制养老保障公平感、医疗保障公平感后，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虽有所减弱（分别对应系数-0.739、-0.763）但仍显著，表明养老保障公平感、医疗保障公平感可能是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重要路径。然而，在控制就业保障公平感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公平感后，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不显著。

综合来看，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公平感在缓解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中可能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这两类制度覆盖人群广泛、与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直接影响个体的公平感。相比之下，尽管就业保障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公平感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显著，但其

在收入差距与社会信任之间的作用尚缺乏充分的实证支持。

表5 不同维度社会保障公平感的机制检验

变 量	(1)	(2)	(3)	(4)	(5)	(6)	(7)	(8)	(9)
	<i>InsFair</i>	<i>EldEval</i>	<i>Trust</i>	<i>MedEval</i>	<i>Trust</i>	<i>EmpEval</i>	<i>Trust</i>	<i>PovEval</i>	<i>Trust</i>
<i>Gini</i>		-1.747*** (0.434)	-0.739* (0.434)	-1.007*** (0.430)	-0.763* (0.430)	-1.107** (0.461)	-0.539 (0.461)	-2.383*** (0.467)	-0.723 (0.469)
<i>EldEval</i>	0.076*** (0.005)		0.127*** (0.003)						
<i>MedEval</i>	0.027*** (0.004)				0.136*** (0.003)				
<i>EmpEval</i>	0.012*** (0.004)						0.151*** (0.003)		
<i>PovEval</i>	0.030*** (0.003)								0.124*** (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725*** (1.060)	0.070*** (0.020)	0.022 (0.020)	0.039** (0.020)	0.024 (0.020)	1.194*** (0.067)	0.017 (0.021)	1.087*** (0.066)	0.021 (0.021)
样本量	15 796	21 581	21 581	22 233	22 233	18 333	18 333	18 382	18 382
R ²	0.150								
LRχ ²		16 710.350	16 728.511	14 696.100	17 411.300	12 845.770	15 007.612	12 655.880	14 693.063

六、异质性分析

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是否因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而异?根据假说3,本文分别以学历和家庭收入水平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代理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①

(一) 基于学历的异质性分析

学历是衡量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不仅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和信息处理水平,也与其收入和社会参与程度密切相关。根据假说3,收入不平等对不同学历群体的社会信任可能存在差异化影响。本文将样本按最高学历划分为四组: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并采用CMP方法分别估计收入不平等对不同学历群体中社会信任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学历越高,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负向边际效应越强。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组的边际效应最强。以社会信任水平评分5和8为例:收入不平等每上升0.1个单位,大学及以上学历组选择5的概率上升3.0%,选择8的概率下降3.7%,上述边际效应的绝对值远高于全样本的平均水平。这表明高学历群体对收入不平等更为敏感。

(二) 基于家庭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收入维度的差异,本文按受访者所在省份的家庭收入分布情况,将样本划分为五组:低收入组(0%—20%分位数)、中低收入组[20%—40%分位数)、中等收入组[40%—60%分位数)、中高收入组[60%—80%分位数)、高收入组[80%—100%分位数],同样采用CMP方法估计各组的边际效应。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对所有收入组的社会信任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中等收入组的边际效应最大,其次为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而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的负向影响相

① 异质性分析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案。

对较弱。以社会信任水平评分5和8为例,对中等收入组而言,收入不平等每上升0.1个单位,选择5的概率上升3.0%,选择8的概率下降2.6%。

(三) 结果讨论与理论解释

综合两类分组结果可知,高学历或家庭收入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的群体对收入不平等更为敏感,这一发现支持假说3。可能的原因在于,高学历或家庭收入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的群体通常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因而对社会公平的感知更为敏锐,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容忍度较低。相比之下,低学历或家庭收入处于低水平的群体可能受限于信息渠道、社会参与度较低,或更关注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对宏观层面收入不平等的感知较弱,所受负面影响较弱。上述结果揭示了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非对称性,这对理解社会信任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启示。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CSS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检验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具有负向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提高居民在收入与财富分配、工作与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平感,均可有效缓解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其中社会保障公平感的作用最突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负向影响在高学历或家庭收入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的群体中更为突出。

基于上述发现,为厚植社会信任根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夯实社会信任的经济基础。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拓宽劳动者增收渠道,推动更多群体进入中等收入范围。同时,强化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健全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协调配套的调节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并从源头上缩小收入差距,为社会信任水平的系统性提升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

第二,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社会保障与信任建设策略。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学历和收入群体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政策设计应重点关注那些受收入不平等冲击较大、社会保障公平感更低的群体(如高学历中产阶层、中等收入家庭等),通过定向福利供给、公平政策宣传等方式,提升上述群体的主观福利体验,增强社会信任。

第三,将提升就业保障的公平感置于优先位置。鉴于就业保障在收入不平等对社会信任影响中的关键作用,应将促进就业公平作为社会信任建设工作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持续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保障劳动者平等获取就业机会的权利,坚决破除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户籍、性别、学历等方面的隐性歧视。另一方面,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切实维护劳动者在薪酬待遇、工时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增强其对就业过程与结果的公平感知。此外,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大龄失业人员等群体,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其市场适应能力和议价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全面提高就业保障的公平感,还能增强社会信任。

参考文献:

- [1] 方亚琴,夏建中.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7):64-84.
- [2] 胡荣,林兆琦. 主观阶层认知、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 2022,42(1):109-125.
- [3]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S95-S120.
- [4] ALESINA A, LA FERRARA E. Who trusts other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 85(2): 207-234.
- [5] USLANER E M, BROWN M. Inequality, trust, and civic engagement[J].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2005, 33(6): 868-894.
- [6] GUSTAVSSON M, JORDAHL H. Inequality and trust in Sweden: some inequalities are more harmful than other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8, 92(1-2): 348-365.
- [7] DELHEY J, NEWTON K. Who trusts? The origins of social trust in seven societies[J]. European societies, 2003, 5(2): 93-137.
- [8] BARONE G, MOCETTI S. Inequality and trust: new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J]. Economic inquiry, 2016, 54(2): 794-809.
- [9] 熊猛,叶一舵. 相对剥夺感:概念、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6, 24(3): 438-453.
- [10] 王珏. 现代社会信任问题的伦理回应[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3): 59-65.
- [11] 翟学伟. 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J]. 社会, 2014, 34(1): 1-26.
- [12] 李俊青,韩其恒,寇海洁. 政府、社会信任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22, 57(6): 26-44.
- [13] 张维迎,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经济研究, 2002(10): 59-70+96.
- [14] GUIS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Trusting the stock market[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8, 63(6): 2557-2600.
- [15] 王正位,王新程. 信任与捐赠:社会网络在捐赠型众筹中的认证作用[J]. 管理世界, 2021, 37(3): 34-50.
- [16] 杨沫,王岩,连大祥. 方言距离、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社会信任[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23(3): 73-85.
- [17] 李骏,吴晓刚. 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3): 114-128.
- [18] BERND W.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judgments [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 7(1): 3-18.
- [19] 赵昕东,赵德金. 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 科学决策, 2024(3): 1-20.
- [20] 李实,张尉. 收入水平、不平等感知与主观福祉[J]. 北京社会科学, 2023(12): 106-121.
- [21] 向德平,李红. 个人理性选择、社会制度环境与居民信任度差异[J]. 重庆社会科学, 2014(4): 39-52.
- [22] NANNESTAD P, SVENDSEN G T, DINESEN P T, et al. Do institutions or culture determine the level of social trust? The natural experiment of migration from non-Western to Western countries [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4, 40(4): 544-565.
- [23] ROBINSON R V, BELL W. Equality, success, and social justice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8, 43(2): 125-143.
- [24] 林聚任,张月阳,向维. 近十年来居民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心态变化趋势与问题——基于 CGSS 有关数据的分析[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5(3): 6-19.
- [25] 杨灿.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与社会态度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19(4): 91-104.
- [26] 李涛,黄纯纯,何兴强,等.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 ——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08, 47(1): 137-152.
- [27] FREEMAN R B. Low-wage employment: is more or less better?[C]// LUCIFORA G, SALVERDA W. Policies for low-wage employment and social exclusion, Milan: FrancoAngeli, 1998: 25-46.
- [28] 叶林祥, GINDLING T H, 李实, 等. 中国企业对最低工资政策的遵守——基于中国六省市企业与员工匹配数据的经验研究[J]. 经济研究, 2015, 50(6): 19-32.
- [29] ROODMAN D. Fitting fully observed recursive mixed-process models with cmp[J]. The stata journal, 2011, 11(2): 159-206.

How Does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 Social Trust : The Mediating Role of Multidimensional Subjective Fairness

YANG Mo¹, CHEN Yu², WANG Xiao²

(1.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Summary: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re crucial for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rust and realiz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During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come inequality remains a pressing issue. Objective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s people's subjective psychological states, negatively impacting interpersonal trust relationships and hinde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trust models based on strange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ocial trust based on the 2015, 2017, and 2019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data and analyzes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subjective fairness. The empirical study find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social trust levels, and for groups with higher education and income levels, the effect is greater. Multiple dimensions of subjective fairness exhibit simultaneous mechanism effects, among which the social security fairness mechanism plays the strongest role. Among various social security evaluations, employment security evaluation has the most prominent effect on enhancing social trust, as it not onl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ocial trust itself but also plays the most central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chain of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ing social trust. Compared with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income inequality on social trust in the new era, which has greater practical value. Second, this paper uses minimum wage income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ddressing endogenous issues such as measurement errors, missing variables, and reverse causality related to income inequality variables, and effectively identify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social trust. Third,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ocial trust remains confined to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while this paper takes subjective fairness as the entry point to deeply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fairnes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income, wealth,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analyzing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s social trust. Fourth,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mong the subjective fairnes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the subjective fairness in the social security dimension has a stronger transmission effect. Enhancing subjective fairness in social security can effectively block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ocial trust, indicating that reside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bottom-line fairness" than to fairness in other dimens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ocial trust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Based on key findings,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key measures. First, to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ocial trust, it is essential to advance reforms 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with a focus on narrowing income disparities. Second, tailored social security and trust-build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for different groups. Third, significant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enhancing the subjective fairness withi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Key words: social trust; income inequality; multidimensional subjective fairness; common prosperity; social security

(责任编辑: 邓 菁)